

以洞見改變世界

——祝賀高錕校長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

在古代，改寫人類歷史的，是具有博大胸襟與無比堅定意志的先知、偉人，所謂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」是也；在現代，改變世界面貌的，卻是靈光一閃的霎那間洞見，百餘年前瑞士專利局某個小職員所發現的時間與空間新觀念是也。在純淨二氧化矽玻璃纖維中光波可以暢通無阻地傳遞訊息的思想，並沒有相對論那麼驚世駭俗，可是它同樣來自霎那間洞見，同樣改變世界。

對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同事來說，高錕頗有些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味道。他1970年來中大，在聯合書院簡陋房舍中創辦電子系的時候，已經作出光纖通訊原理的大發現好幾年，但大家並不甚了解，所見到的，只是個有孩童般可愛笑容，脾氣有些執拗古怪的好人。短短四年後，他飄然遠引，到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(ITT)去主持發展光纖通訊體系的大業。這無疑是他生命中的高潮，是他從了解世界到進一步改變世界的輝煌時刻。可是，在為了體制改革鬧得翻天覆地的中大校園，在為了九七回歸弄得人心惶惶的香港，大家對這靜悄悄進行的遠方革命毫無感覺；1985年他回來領受名譽學位也正如驚鴻一瞥，沒有勾起多少反應。

當然，再不久他就挾着「光纖之父」的美譽回到中大來主持校政了。在十年漫長歲月裏，他創辦工學院、建築系，推動大學行政體制改革和重組，以謙厚沉實的風格贏得了社會的普遍尊敬。但坦白說，從旁看來，他所付出恐怕遠遠超過所得。這不奇怪，因為他碰上了香港人最困擾、焦

慮、恐懼、憤懣的十年：它開始於1980年代末的國家悲劇和由是引發的香港移民潮，結束於香港在中英連綿不斷的爭拗聲中來到回歸祖國前夕。在這期間，大學學制和退休金制度都被迫作出根本改變，氣氛之沉悶鬱結可想而知。很自然地，高錕校長成為無窮爭論、爭執的焦點。他不善辭令也不工心計，對無窮的人事糾紛，對學生的無理攻擊乃至謾罵，往往顯得束手無策，應付維艱，這在他心理上造成了怎樣的衝擊和創傷，實在無法估量。

他對中國文化研究所和我個人的支持、付出，也遠遠超過回報。1990年我和所中同仁創辦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，需要調動所內相當一部分人力和資源，可是呈到校方的報告很快就批准了；創刊號出版的時候，慶祝酒會上他不斷舉杯和展現燦爛笑容，成為全



與《二十一世紀》同仁分享創刊號出版的喜悅，1990年10月。



在李卓敏校長銅像致贈儀式上，2005年11月：(左起)馬臨校長、高錕校長伉儷、金耀基校長和作者。

場焦點。此後數年間，這份刊物在海內外贏得許多知識份子的欣賞和支持，建立起聲望和地位，然而「名滿天下，謗亦隨之」，校內對它開銷和取向的批評也不絕如縷，由是所帶來的沉重壓力，至終還是得由校長承擔；同樣，研究所整體也是在他任內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機會。然而，說來委實慚愧，我卻辜負了他數度邀請回到大學本部共事的美意，不曾應命，唯一沒有辜負的，只是登山踏青，享受片刻輕鬆和寧靜的三春之約而已。

所幸十年只如過眼雲煙，香港歡慶回歸之際，高錕也恢復了自由自在的閒雲野鶴生涯：寫作、演講、辦企業、辦學校——當然，還有周遊世界各地，接受紛至沓來的獎章、獎項、榮譽學位、榮譽院士名銜。其實，從1990年代初開始，這些榮譽就已經在累積了，久而久之，在同儕心目中也就習以為常，再不感覺有何稀罕，有何特殊意義。退休後十多年間他並沒有離開香港，但因為一貫保持低調，就逐步從大學和公眾的視野消失了。只是到數年前，當他開始出現老年

痴呆徵狀的時候，才再度引起學生、同事和朋友的震驚和關注，感覺到這是他再一趨飄然退隱的先兆。事實上，隨着他病情日益加劇，今年6月間他們夫婦也就的確告別香江，移居美國西岸灣區，以便經常和兒女相聚了。

然而，一度那麼眷顧高錕的命運之神雖然好像已經不顧而去，卻並沒有忘記他。誠然，在垂暮之年，在意識搖擺於夕照與黑夜之間的黃昏，諾貝爾獎是來得太晚了。可是，對淡薄名利榮辱如高錕那樣的人來說，遲早又有甚麼分別呢？世界早已經被徹底改變，現在只不過是它回過頭來，承認他的霎那間洞見而已，除此之外，他已經別無所求，這個世界雖然美好，也再沒有甚麼可以回報給他的了。

我們在此，默默感謝多年相聚、共事，同享山川勝境的緣分，衷心祝禱他今後歲月的幸福與安寧。

——陳方正